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 工部局乐队传奇

〔日〕榎本泰子著 赵 怡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 工部局乐队传奇

〔日〕榎本泰子著 赵 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日)榎本泰子著;赵怡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12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326 - 2580 - 2

I. 西... II. ①榎... ②赵... III. 上海市—地方史—史料—近代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8284 号

上海辞书出版社业经本书作者榎本泰子授权
取得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9 - 2009 - 433 号

责任编辑 赵 航
封面设计 姜 明
版式设计 杨钟玮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 ewen. cc www. cishu. com. 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3.875 插页 1 字数 157 000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580 - 2/K · 669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2431119

总 序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城市的出现均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城市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还是近五十年的事。

近代以前,城市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随着 18 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180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3%。1900 年上升为 13.6%。2007 年 5 月 23 日,世界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50%,也就是说,世界城市人口从此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在 1949 年的城市化率为 10.6%。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至 2008 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 46%,有 655 座城市,其中百万人以上特大城市 122 座,超大城市 39 座,有 6.07 亿城市人口,地级市以上城市的 GDP 已占全国的 62%。

无论在世界,在中国,城市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地位的日益加重,城市史研究突飞猛进。

在西方,城市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城市史

开始受到重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于发达国家二十年,但大体上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提速同步。1986 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史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城市史研究的整体重视。此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呈井喷之势,疾速发展,各种城市史论著,包括单体城市研究、城市群研究、不同类型城市比较研究、城市史研究方法研究等,姹紫嫣红,目不暇给。与此相一致,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快速发展,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苏州、扬州、自贡等均有专著出版,其中对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研究成果尤为丰富。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已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国内外不同学术背景的机构、学者就城市史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已是常态。前几年,我们选译过一套《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凡 12 本,颇受学界重视,但也有诸多遗珠之憾。有鉴于此,我们选译了这套《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意在介绍海外学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就风格而言,这套书是《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的继续,就范围而言,则是《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的放大。

翻译本是苦活,加上研究单位在成果考核时,多不给译作计分,这样,此项工作的推进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令人欣慰的是,有一批学者乐于此道,志在学术,甘于奉献。我们相信,此项工作对于繁荣中国城市史研究、提升中国城市史研究水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众擎易举。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同行加入进来!

熊月之

2009 年 10 月 28 日

序曲 世纪长河

缓缓流过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隔江相望的两岸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东岸即“浦东”地区，高耸着充满现代气息的电视塔和各种摩天大楼。那种壮观的景象已经成为 21 世纪中国的象征而深深印入了人们的脑海。

而浦江西岸即“浦西”的滨江大道上，则蜿蜒着一排排厚重的砖石建筑群。高耸的钟楼，雄伟的圆柱，令人仿佛置身于欧洲的街区。虽然现在外壁变得灰暗，和周围的摩天大楼相比不再那么光鲜夺目，但是正是这些西式建筑构成了昔日上海靓丽的门面，让外来的旅人人为之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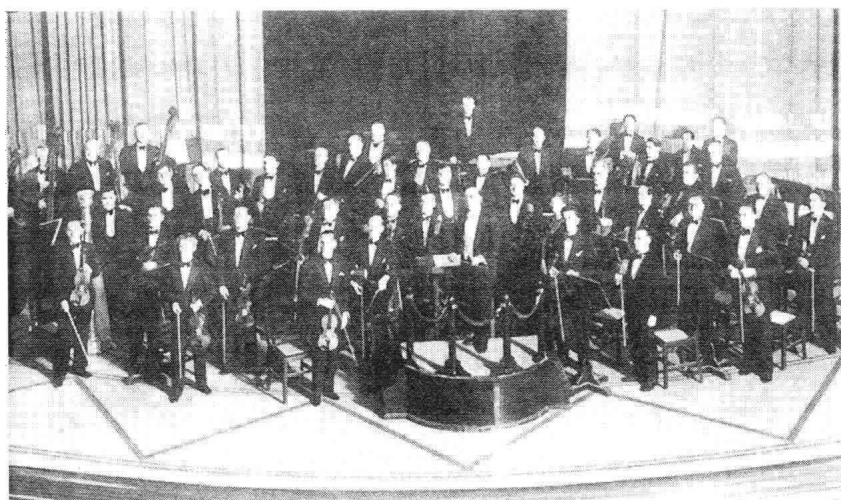
百年前的上海曾经是西方人的街区。这个由英国人作为自己的贸易据点而开辟的港口城市，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他们又在这里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外国人生活的地区当时被称之为“租界”，而当时的西方人将全套欧洲生活方式都搬进了租界，衣食住行以及赛马、网球、舞会等等，一切都希望和自己祖国的一模一样。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西方式的街区。

滨江大道北端有一个公园，即现在的黄浦公园，里面高耸着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碑。而这里以前称

之为外滩公园,曾经是欧洲人歇息的场所:郁郁葱葱的林荫下是宽阔的步道,头戴礼帽的绅士和身穿洋装的淑女挽手并肩,缓缓而行。走累了可以坐到长椅上歇息,江面上吹来的凉风惬意宜人。而带屋顶的露天音乐堂的舞台上,身穿白色制服的乐队正在演出,轻快的乐曲顺风飘来,更添情趣……

外滩公园的乐队演奏,对当时生活在上海租界的欧洲人来说,实在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因为他们远离祖国,生活在亚洲的土地上,自然更加迫切地寻求欧洲文化的馨香。虽然他们无法把欧洲的名画或雕刻作品搬到亚洲来,但是至少可以将乐器和乐谱带来。他们最初是自娱自乐,后来慢慢地组成了乐队,并将之发展为都市乐团。从一个小小的乐队,发展到被称之为东亚第一交响乐团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正好和上海的西方侨民的生活史相吻合。

可惜迄今为止,人们在讲述上海租界史的时候,很少将视线投向音乐文化这个层面。和砖石建筑不同,音乐留不下痕迹。上海的



1936年,工部局乐队于大光明戏院

西方侨民当年聆听的音乐,无法在百年后再传入我们的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资料,去寻求他们当年所追求的音乐。那些西方音乐家为什么要远离祖国,踏上亚洲的土地呢?在租界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又举办了什么样的演奏活动呢?一个乐队,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了下来,其背后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本书所叙述的,就是深受上海西方侨民所爱戴的“都市乐队”的故事。这支19世纪末在亚洲生根发芽的西方乐队,历经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变迁,最终为中国人所继承,如今作为“上海交响乐团”而衍生发展着。一个跨越了三个世纪,并且乐手亦从外国人转为本国人的,但仍然得以续存下来的交响乐队,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如果我们努力追寻参与这支“都市乐队”活动的有关人员的足迹,自然可以发现这些昔日欧洲音乐史上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们,是如何在大上海谱写出一曲曲历史乐章来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乐曲还漂洋过海,令隔海相望的日本在接受西方音乐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推而广之,在近代以来的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上海这



工部局乐队进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彩排情景

个城市占有怎样的位置也就不言自明了。可以说,这支“都市乐队”的故事,就是一个描写以上海为舞台中心,跨海越洋闯世界的旅人和音乐的故事。

让我们静静地伫立在黄浦江畔,倾听波涛的翻滚吧。你注意到了吧,波涛声中不时有汽笛传来,而在那背后,隐隐的是灿烂的小号声,听到了吗? ……来吧,大幕拉开,交响乐开演了。

目录

序曲 世纪长河	1
第一章 诞生于上海的“西方”（1845年— ）	1
1 英国人的街区	1
2 大商人的“投资”	4
3 业余爱乐家们的活跃	7
4 音乐会之始	11
第二章 公共乐队的诞生（1879年— ）	19
1 “都市乐队”的成立	19
2 市民生活与管乐队	23
3 职业音乐家的活跃	28
4 上海乐队与天津乐队	33
第三章 德国音乐家的命运（1906年— ）	42
1 对管弦乐队的向往	42
2 变化中的社区音乐	50
3 战俘音乐家	56
4 恩格尔管弦乐队与日本人	59
5 “乐队队长”米利埃斯音乐生涯	68

第四章 大师登场（1919年— ）	82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困境	82
2 梅百器的一搏	84
3 工部局乐队的诞生	95
4 黄金期的音乐会	97
5 从俄罗斯到远东	104
6 世界中的上海	108
7 大师的活跃	114
 第五章 大都会交响乐（1929年— ）	 121
1 动荡不安的都市	121
2 中国人与西方音乐	124
3 乐队存废问题	137
4 租界的终结	149
 尾声 日本人与“上海交响乐团”（1942—1945）	 159
后记一	183
后记二	193
 插图出处一览	 195
参考文献	199
上海工部局乐队史年表	205

第一章 诞生于上海的“西方”

(1845 年—)

1 英国人的街区

英国人最早来到上海是在 1843 年。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英军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了清军,迫使清政府于 1842 年缔结了《南京条约》。英国政府在条约中提出割让香港岛,以及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城市的条件。在此之前英国一直以南方的广州为据点进行贸易活动,但是他们力求摆脱清朝独特的贸易习惯的束缚,寻求新的自由贸易空间。

上海位于长江(扬子江)支流的黄浦江沿岸,百川通衢,历来是交通要道。早期来上海的英国人乘船溯黄浦江而上,也许多少能够感觉到一点儿伦敦的泰晤士河的情致。从船上放眼望去的中国大地,是他们餐桌上一日不可或缺的茶的生产地,也是他们令人神往的丝绸之故乡。同时中国也是英国人倾销本国高速增产的各种工业产品以及产自殖民地印度的大量鸦片的绝好市场。对于致力于扩张贸易的英国商人来说,上海无疑是他们得以致富的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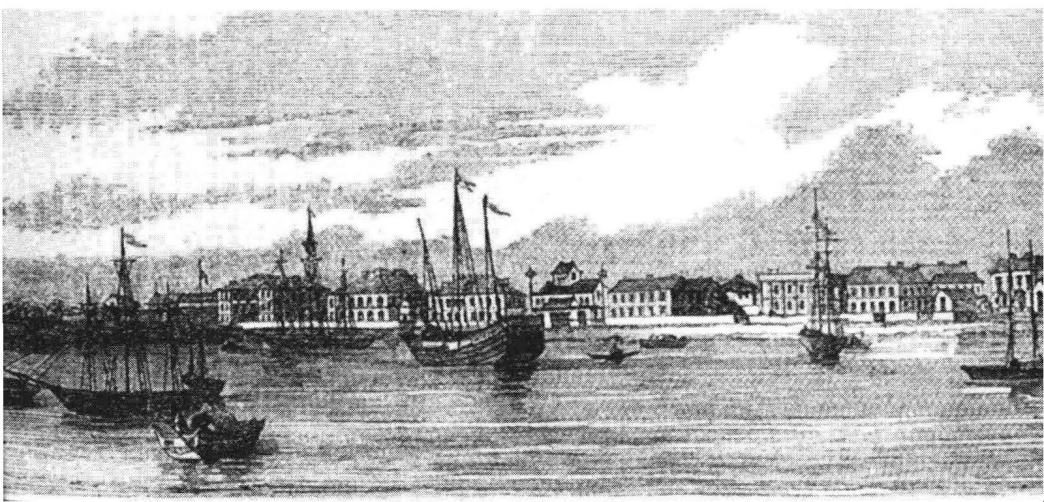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当时的上海,除了由高高的城墙围绕着的县城(清政府上海县所在地)以外,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1845 年英租界设置后,人们首先必须从建设港口、铺设道路等基础工程着手。

最早感知到上海巨大潜力的贸易商——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的商人们,有时甚至违背他们本国政府的意图,齐心协力,力图将上海变成一个自由贸易的据点,一个自治的堡垒。当时上海英国领事的权限还相当薄弱,之后在做棉线和茶生意上大发横财的商人们企图通过协商来推动上海的政治。

稍晚于英国,美国和法国也分别于 1848 年和 1849 年在上海设立租界。至 19 世纪 60 年代,美租界和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而法租界仍然保持了它的独立性。本书的话题,将主要围绕以英国侨民为中心的公共租界的文化活动而展开。

有关公共租界的外国侨民初期的生活情况,人们常常引用卜舫济(Hawks Pott)的《上海简史》中的叙述。卜舫济在书中提到:“人们常说,英国人所到之处必有教堂和赛马场。上海自然也不会例外。初期的居民们一样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体育娱乐而不惜重金。”¹

当时的英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黄金时代,以印度为首,英国在亚洲和非洲各地拥有大量的殖民地。而随之而来的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建立的生活街区,而这些地区里必备无疑的是“教堂和赛马场”。上海也早在 1847 年就建立了圣三一堂,它成为英国侨民慰藉心灵的地方。而人们在这些教堂里所诵唱的赞美歌,应该说就是最早流传进上海的西方音乐吧。在那之后,随着欧美各国的各种会派在上海建立大大小小的各种教堂,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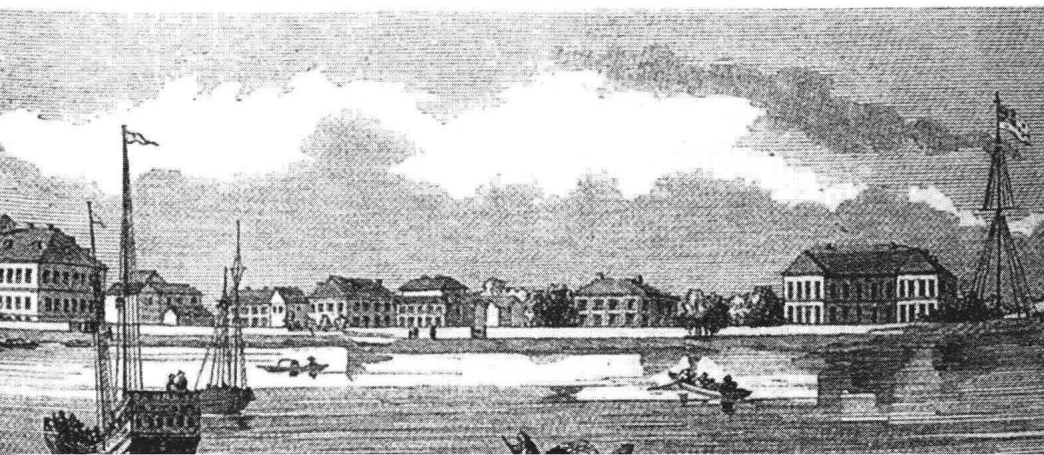


面向中国人的传教和教育活动愈来愈盛,西方音乐也以赞美歌和管风琴的形式传播开来。

那么赛马场呢?据说上海在英租界成立的翌年就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公园(人称“老公园”),在那儿已经开始有了赛马竞赛。1850年又重新建造了新的公园和赛马场(上海骑马场,又称新公园),同时也可以作为日常的骑马道。当时蒙古马的买卖非常兴旺,绅士们都热衷于对一匹好马评头品足。之所以租界成立伊始就开始赛马,是因为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赛马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交场合。人们可以一边观看赛马一边高谈阔论,交换各种信息,扩展交友圈子。在信息传播的手段还相当欠缺的时代,这种能够聚集大量群体的社交空间称得上难能可贵。

此外,在早期的上海租界,赛马和各种户外运动最先发达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缘于当时的外国侨民几乎都是男性的关系吧。最早的赛马场建立于1850年,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创刊之年。该报第一号(8月3号)上刊载的外国侨民名单详细记载了各人的姓名、职业、所属公司或洋行名称以及家眷的情况。而全部157人中带有家眷的仅有31人。而且有家眷的除了英领事阿礼国以外,几乎都是传教士。也就是说虽然商人占了外国侨民的大部分,但他们大多是单身。当时很

19世纪50年代的外滩



多英国商社都将有能力的单身男性选送到上海,而这些男人们都指望在短期内发一笔财,然后衣锦还乡。

当然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人已经结婚,将家眷留在国内只身来到异国他乡。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携家眷同行,是因为欧洲人很难适应上海的高温多湿天气。他们首先必须建造新居来抵挡炎热,并确保卫生的饮用水和食品。此外草创期的租界也常受中国不安定的政治局势的影响。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1853年与之呼应的“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英、美、法各国宣布租界中立,而衰弱的清政府也已经无力抑制这些武装起义。大量的中国难民涌进原本专为外国侨民居住的租界地区,而这种“华洋杂居”的情况之后便一直延续下来。1860年、1862年租界还两次受到太平天国的攻击,英法联军和由侨民组成的义勇军(万国商团)负责起了租界的防卫工作。直到1864年各国军队援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的社会和经济都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因此,19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上海租界地区很少能看到外国妇女和孩子的身影。

在当时租界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赛马、骑马、打猎、乘坐游艇出外郊游之类就成了主要的娱乐活动。而板球、长拍网球(和普通的网球相比,球拍柄稍长,面稍小一些)、保龄球之类的球类活动也于19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盛行,并开始组成各种俱乐部定期活动或比赛。这些娱乐活动,对于那些在贸易和房地产生意中激烈竞争的男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解脱,当然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换和社交往来的场所。

2 大商人的“投资”

英国人将黄浦江西岸的江畔大道称之为 The Bund(外滩)。在

那之后在其他国家建立的外国人居住地,比如横滨,只要是沿江大道,英语中也作同样称呼。上海沿着外滩大道,各种商业大楼鳞次栉比,令这一带逐渐成了商业的中心。上海的开发是从外滩开始逐渐向西延伸的,因此离外滩愈近,地价愈高,愈远则愈便宜。建造于1854年的第二个赛马场也是由于地价的上升而西迁,1862年又建成了第三个赛马场,俗称“跑马厅”,其旧址就是现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与人民公园一带。

其实,在第二个赛马场西迁之前的1860年,四个外国人买下了跑道内侧部分的土地,将其作为公共体育场。由侨民选出的委员会负责场地的管理,板球总会和长拍网球总会等都将其作为活动场地。1862年赛马场西迁时,土地所有者按原价将土地转让给了委员会,而委员会则将地价上扬后的体育场卖掉,从而得到一笔巨资,并将其作为上海运动事业基金(Shanghai Recreation Fund),用于租界的公共福利事业。这笔钱首先被用来买下新的赛马场内侧的土地,重建了一个综合体育场,除了板球场和长拍网球场之外,还造了网球场、足球场、高尔夫球场以及游泳池等,用来租借给各种俱乐部。而接受基金的还不止是这些体育团体。上海最早的正式社交场所,上海总会(开放于1864年)和外滩公园(开放于1868年)的建设都得益于基金不少。²

这里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最早建设体育场的那四个外国人放弃个人利益而将场地低价让给委员会之举。而这四个人当中,就有租界草创期著名的宝顺洋行会长亨利·颠地。在生意人圈子里,原本很难想象上海的外国商人会做这种损己利人的事情,但是他们为了租界全体居民的娱乐生活,还是很亮了一下自己的绅士风度。

而租界居民福利事业的发展,并非靠租界的行政主导,而是靠部分有识之士赞助这件事,也与当时上海租界的政治制度有着很大

的联系。这里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租界的行政机制吧。

最早进驻上海的英国人,原本根据约定应该向中国的土地所有者交付地租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而英国领事则负责借家和地主之间的交涉。但是事实上,土地使用者应该交付的地租后来变成了税金直接交给了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原本应该和中国人之间所有的租赁关系也就形同虚设了。租界成立初期,港口、道路、桥梁之类公共设施均由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n Roads and Jetties)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租地人的代表构成,成为事实上的租界行政机构。

1854年,道路码头委员会解散,董事会(Municipal Council)成立,英、法、美各租界合并,由一个行政机构统一运营。然而1862年,法国又重新独立出来,拥有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公董局,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并成立了公共租界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工部局是“Municipal Council”(原意为市政委员会——译者注)的中文译名,据说是因为租界的行政机构向来从事的事业以道路建设之类的“工事”为主,所以取了这样的译名。

工部局的执政机构最初是仅有几个董事构成的董事会。董事是由纳税人选出的租界居民中的头面人物,没有工资,属于一种名誉职务。而有选举权的“纳税人”也仅指交纳一定税额以上的,少数的“高额纳税人”。纳税人会议一年举行一次,类似议会,成为居民决定自己意见的场所。但是后来工部局开始雇用专职的职员,机构渐渐庞大起来。19世纪80年代,董事会下面设有财政、工务、警务三个委员会,各个委员会下有总务局分管具体事务。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委员会的数目也大大增加,工部局已成为一个拥有7 000名员工的庞大的行政机关。

卜舛济在《上海简史》中提出,有人批评董事会执行的是“大班寡头政治”。³大班在上海话中是商社洋行的主人,也就是大商人的